第13卷 第2期 植物分类学报 1975年4月

问题讨论

我们对如何编写《中国植物志》的一些看法

我们看了本学报第十三卷一期上刊载的李朝銮同志所写《如何多快好省地编写〈中国植物志〉的几点浅见》一文后，感到讨论这样的问题很好，这对于如何尽快地、更好地把《中国植物志》编写出来，是有积极的意义。下面谈谈我们的几点看法：

一、是革新还是守旧？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口头上谁也不会反对革新而去守旧，但是如何革新并真正做到革新，就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旧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旧的一套工作方法，还在影响、束缚我们，使我们这些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立足点还没有完全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的知识分子，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老路。尤其是植物分类学长期以来已形成了某些陈规，其中烦琐哲学、形式主义尤其突出。对这些陈规是墨守呢，还是革新呢！我们觉得许多方面都是可以讨论的。

1.对质量或水平的看法：作为我国植物资源的基本资料的《中国植物志》，其质量的好坏，首先应该看它是否能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是否能为身居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广大工农兵所利用。他们就是质量检查员。如果不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而亦步亦趋地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跑，并以此沾沾自喜，认为已达到"国际水平"。那么这种"国际水平"的《中国植物志》到底是为什么人编写的呢？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对质量的看法仍然离不开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

2.关于文献的考证及引证的问题：在分类工作中，文献考证往往花费大量的时间还不能解决问题，这是由于解放前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造成的。不少外国人把在我国采集到的大量标本或苗木、种子带回去后发表不少新种。有的原始描述比较简单，甚至是仅仅根据一张残缺不全的标本发表的。这些资料有些我们手头还没有。如果陷入考证文献的故纸堆里，被死人、洋人牵着鼻子，为了个别种的考证走进死胡同，这样既影响编写进度，也编不出有质量的志书，这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可以用其他比较可靠的文献作为定名的依据，或者，如果不是重要的种，可以暂时放一放。

文献引证则往往是分类学中烦琐哲学的表现形式之一。以往那种大量引证文献的做法，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文献引证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说明定名的依据，二是澄清名称上的混乱。所引证的文献能达到这两个目的就行了，不必把所参考过的文献统统写进去。如果连自己也没见到的文献也照抄一遍那就更无必要了。同时，我们还认为所引证的文献应该是重要的，并且也是比较常用的。

3.关于科、属以下的分类等级问题：我们不笼统地反对适当地增加一些等级。如果某些大科或属客观上存在着界线清楚的若干群植物，为了便于掌握它们，恰当地增加等级还是可取的。但有时分得太多、过细，或者同级之间界线不清也要硬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描述多次重复，增加了无用的篇幅。事实上这也是分类学中经常可以见到的烦琐哲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又影响进度。更重要的是在编制检索表时，既要照顾到各分类等级的特征，又要考虑各属或种的区别，造成检索表中特征的混乱，使得两个相对的特征模棱两可，无法确定。这样的检索表不要说广大工农兵不能查，就是专业人员也无法使用。因此我们认为增加等级应从严掌握，决不能搞形式主义。同样，种的界线也应该清楚，那些过去分得太细以致界线不清的种应予归并。发表新种尤其要慎重。

4.关于描述：烦琐哲学也表现在描述中，而且根深蒂固，不易改革。描述一种植物时一定要按(根)、茎、叶、花、果实、种子这套"八股"，少了一

样就觉得有些不象“样子”，心里觉得别扭。如某些草本植物秆、叶的长短宽窄，一般来说在鉴定时并无多大意义。但也一定要写，那怕只写几个字也是好的。实际上就是编写者本人，对他所熟悉的那些植物的认识也决不是这么全面，而仅仅是掌握了某些易于与其他种相区别的主要特征而已。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要求我们的读者去看那些连他自己也不去注意的东西呢？因此我们认为种的描述要大大精简，以写鉴别特征为主，便于使用者掌握。

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植物分类学中的这种现象似乎更严重一些，改革就更加必要，特别是形式主义，烦琐哲学一定要改掉。

二、要大力提倡工农兵参加志书的编写工作。广大工农兵参加编写志书，这是一个路线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一伙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干扰，广大工农兵群众被排斥，没有在编写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工农兵参加编志书就成为现实。这对于改变«中国植物志»编写队伍的成分，实现上层建筑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这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闯出一条我国编写植物志的新路子所必需的。

科学来源于生产实践。让工农兵自己来总结这些实践经验，写进志书中，再去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对于植物分类学的工作，对于志书的编写就是一个重大的革新。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志书编写小组，在野外采集竹类标本的过程中，依靠老工人，老农民及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在较短的时间内采到不少竹类标本，学到不少过去书本上所没有的识别竹类植物的知识。虽然这仅仅是个开始，但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凡是参加编志的同志都可以这样做。我们不仅要虚心地去向工农兵学习、请教，而是把他们请进来一道编写，政治上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业务上向他们再学习，共同努力，为把«中国植物志»编得又快、又好作出贡献。

（内蒙古农牧学院、内蒙古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大学禾本科编写小组）